

论语中国



“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三大问题：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村就

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

12月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2009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迎来极为困难的一年。



“这么多年，对这些谣言已经习以为常了。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这个人

怎么样，老百姓自然会有公论。”

12月2日，北京公交集团对近日网上传言著名劳模李素丽因贪污等原因被抓辟谣，李素丽接受媒体采访。



“几十个人争一个职位已不是新闻，这就足以说明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另外，公务员的增薪来自纳税人的钱，这些钱留在纳税人手里本来也会

‘拉动内需’，一增一减，也就等于没有‘拉动内需’的作用。”

12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分析中国公务员是否应增薪。



“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可能将是经济最困难时期。”

12月4日，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出席第十二届商业周刊CEO年会。



“中国的保险监管一直落后于市场，很多时候，保险监管似乎对于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

为后知后觉，或者就是监而不管。”

12月5日，新华财经副总裁陈松兴接受媒体采访。



“感觉黎明没到期待的那个点，比如这场戏应该给观众带来快乐，这场戏应该给观众愤怒的情绪，总感觉差那么一点点。”

12月6日，陈红与陈凯歌携《梅兰芳》主演亮相广州，和影迷、媒体会面。



“经济衰退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市场和消费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要冬眠，要用系统的方法来寻求在困难时期如何很好的度过。”

12月7日，美国科特勒咨询集团中国区总裁曹虎博士在2008中国营销高峰论坛暨第三届金麒麟奖颁奖典礼上谈营销。

到处是“最赚钱公司”

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童大焕(北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出租车罢运事件，成为今年11月初以来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伤痕般的“风景”。面对此情此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打破官场的沉默，公开声称，出租车公司总的资本回报率平均每年达50%，甚至高达70%—80%，实在是“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的行业”。

事实上，说出租车公司“全世界投资回报率最好”不假，但黄副市长关于每年投资回报率70%~80%的说法，还是大有保留的。目前，大部分城市出租车经营权是政府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转让的，最初多为无偿或低价转让，但却被公司垄断炒卖，有的城市一辆出租车经营权被炒到上百万元。公司廉价(至少公开账面上是如此)获得经营权，司机则出资购车(甚至除了购车费用还有一大堆风险金之类的费用)，承担一切运营费用，按月给公司上缴管理费。这样的出租车经营模式，一切成本(包括政府“公关”成本)事实上全部转嫁给了出租车司机，这做的其实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岂止70%—80%的年投资回报率？媒体披露，北京某出租车公司2003年的“工作餐费”达440多万元，某公司党委成员的月工资为21544元。与此同时，作为实际运营主体、承担着全部运营责任与运营风险的出租车司机，其收入却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因为70%至80%的收入都归了出租车公司。

类似的世界最赚钱公司、世界最赚钱行业岂止是出租车公司乎？像中石油这样举世闻名的“亚洲最赚钱公司”就不说了，还有许多没有被充分“挖掘”和总结的公司或行业，也正正在那儿经年累月地过着世界最赚钱公司的好日子呢！

比如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药品购销集团，通过医院“医药不分”这只神奇的手，可以将

出厂价的药品以十倍百倍的价格推销给患者。导致从整体上，落到患者手中的药品，平均出厂价不到药价的10%到20%。也就是说，平均出厂价1元的药，药商集团可以卖到10至20元，他们赚取了9至19倍的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并没有落到厂家和医院手里，而是绝大部分被医药代理商、医药代表、医生、药品采购管理人员、医院领导甚至卫生监督、药品监管、招标采购等“隐性参与者”瓜分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公司是地方政府，他们在拆迁征地中往往也成为“世界最赚钱公司”。2003年，笔者曾根据有关上海的一份媒体公开资料算过账，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廉价征地，再通过公开拍卖形式卖出，一进一出，最低差价是40倍，最高差价达285倍！这么多年过去，各地天价地王频出，利润差应该更大了吧？

以上，笔者只是随意拎出了几个内地“世界最赚钱公司”或行当的例子，想必还会有更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给总结总结，也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断会有新发现。

眼看着“世界最赚钱公司”频频出现在中国，这应是国人多大的骄傲啊！然而一切正如萧伯纳的一个笑话：萧伯纳很瘦，在一次宴会上，一个肥头大脸的富翁笑着对萧伯纳说：“萧伯纳先生，一见到你，我就知道目前世界在闹饥荒。”萧伯纳立刻说：

“先生，见到你，我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是啊，一边是国内这么多“世界最赚钱公司”，一边是很多国人面黄肌瘦“闹饥荒”。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等“几家欢乐几家愁，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局面旷日持久，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我国在不少方面的决策与执行体制高度合一，行政权独大，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像医改、教改、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改革的生杀大权握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行业主管部门手里，而不是握在利益更为中立的人大机关手里，于是总是议而不决，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或者即使改革，也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司法地方化”使得我们的法律有时出不了人民大会堂，就像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一样。就说这很简单的出租车的事儿吧，明明有《行政许可法》规定市场可以自由调节的，不设行政许可，但人家不理睬你这个法，你也没办法。

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媒体报道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突破口之一，基层法院财政将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这将改变目前由同级财政负担的做法，由此改变司法单位依赖地方的“司法地方化”现状。

而要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逐利倾向，还要从坐实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起，做强、做精、做实人大，将重大决策、立法权和财政权等交到人大手里，形成重大事项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司法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

“皇帝”活在国人心里

文\本刊特约撰稿人 周英杰(山东烟台)

满清皇帝退位后，很多善良的中国人

都认为泱泱华夏自此就是“民国”，就可以迈入世界民主国家之列了。然而，正像清末民初的学界奇人辜鸿铭“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论述一样，“皇帝”其实也是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之别的。是的，辛亥革命后，那个坐在故宫里吆三喝四、发号施令的“有形的”皇帝的确是不存在了。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皇帝”，依然在占据着中国人的精神和意识。这个“皇帝”不但没有退位，而且还因为无形的皇帝的骤然死亡而变得愈发顽固。

因为这个无形的皇帝依然活在国人的心里，所以民国以来，很有一些人因为没有个有形的皇帝管着而“如丧考妣”，一俟条件成熟时便非要制造出来个有形的皇帝招摇过市不可。于是，在溥仪退位之后不久，先有枭雄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后有“辩师”张勋和“圣人”康有为的“复辟”闹剧。虽然这些试图为中国人找个有形的皇帝的种种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了，但是那个无形的“皇帝情结”却远远没有从此销声匿迹。

更进一步来说，由于我们民族的潜意识里具有的这种浓重的“皇帝情结”，所以真皇帝，也能制造出来“变种皇帝”——不是皇帝的皇帝。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演绎下来，直到今天我们才懂得：其实并不一定非得要穿龙袍、张口闭口“朕”如何如何，才是皇帝。有些皇帝虽然不穿龙袍、不在太和殿上办公，但是他却照样是皇帝，照样要让人民喊他“万岁”，照样一言九鼎享受皇帝般的拥戴。而且就其

对国家、人民的戕害程度而言，其烈度丝毫不亚于那个为中国开创了皇帝体制的秦始皇。

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了30年的今天，这种无形的“皇帝情结”依然还在时不时地蹦将出来招摇过市。君不见，即使是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不也经常要被《雍正王朝》、《康熙大帝》这样盛大的“皇帝赞歌”所占据着吗？对此，当然也有批评，譬如有的人就说：中华历史洋洋大观，为什么总是拿满族那几个皇帝说事？难道汉族就没有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威武大帝了吗？话刚落地，《汉武帝》、《贞观长歌》便又粉墨登场……眼瞅着屏幕上整天“我皇圣明”、“皇上万岁”、“奴才微臣”之类的狂号，真令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实际上，不光是屏幕上在为皇帝招魂，皇帝的阴魂还常常附着在现实生活之中。记得前些年河南的《大河报》上曾经有一篇《变态老师想做皇帝，逼学生上课喊“万岁”》的报道，披露的是河南省原阳县蒋庄乡堤东村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杜姓班主任，强迫孩子们模仿古代大臣上朝时的情景，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万岁”的事情。

最近的例子出在西南大学。据11月25日的《重庆商报》报道：这个学校的200名学生佳丽最近参加了由学校社团组织的“校园版林黛玉”活动，最后有30名佳丽胜出。当这些稚气未脱的女大学生面对众多的观众练嗓时，你绝然想象不到她们齐齐喊出的竟然是一声悠长的“皇上”。

我们自然不能光是笑话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其实，这个国家的别人的难道就一定与皇帝绝缘了吗？我看未必。倘若仔细推敲起来，恐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皇帝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而只要这个无形的皇帝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就一定只是个十分遥远的梦想。

“先生，见到你，我就知道闹饥荒的原因。”是啊，一边是国内这么多“世界最赚钱公司”，一边是很多国人面黄肌瘦“闹饥荒”。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此等“几家欢乐几家愁，西湖歌舞几时休”的局面旷日持久，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我国在不少方面的决策与执行体制高度合一，行政权独大，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像医改、教改、出租车管理体制改革，等等，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改革的生杀大权握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行业主管部门手里，而不是握在利益更为中立的人大机关手里，于是总是议而不决，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或者即使改革，也是换汤不换药。

二是“司法地方化”使得我们的法律有时出不了人民大会堂，就像政令有时出不了中南海一样。就说这很简单的出租车的事儿吧，明明有《行政许可法》规定市场可以自由调节的，不设行政许可，但人家不理睬你这个法，你也没办法。

一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是，媒体报道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作为突破口之一，基层法院财政将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证，这将改变目前由同级财政负担的做法，由此改变司法单位依赖地方的“司法地方化”现状。

而要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逐利倾向，还要从坐实我国的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起，做强、做精、做实人大，将重大决策、立法权和财政权等交到人大手里，形成重大事项人大决策——政府执行——司法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

先锋杂文

更何況是像厉先生这样，能够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听了厉以宁的话，正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万般绝望的穷人，一定会突然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又缓缓地地从麻木中苏醒过来，打个喷嚏，提了提神儿，开始分享厉以宁给中国带来的精神胜利成果。伟大的厉以宁，伟大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一个厉以宁是不够的，更多的厉以宁一样的伟大的专家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近来中科院院士蒋有绪正大声疾呼，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因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这片土地从来不可缺少神奇，这片神奇的土地总是诞生神奇的悠悠专家。

何谓“待富者”？

文\鲁扬

中国的专家一向会“语出惊人”，或者叫耸人听闻。中国也多是唯上、唯利、唯书的专家，独缺的就是有独立品格、有骨气、有良知、只唯实的专家。

上个月，厉以宁教授做客强国论坛，在回答网民质疑张维迎教授在《小康》杂志访谈时讲到“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的问题时，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性理论”，即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称为“待富者”。厉以宁先生真不愧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汉语言学家”，他充分把握了汉语言的精髓和汉文化的要旨。他的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一下子

就把中国变成了没有穷人的国家。纵观厉以宁的语录精粹，我们不得不高呼：厉先生真是大有才了！

根据厉先生给予的拓展性的思维联想，我们可以得出：光棍不叫光棍，叫待娶者；老姑娘不叫老姑娘，叫待嫁者；孕妇不叫孕妇，叫待产者；醉鬼不叫醉鬼，叫待醒者；贪官不叫贪官，叫待廉者；侏儒不叫侏儒，叫待高者；懒惰不叫懒惰，叫待勤者；下岗不叫下岗，叫待薪者；秃子不叫秃子，叫待毛者；妓女不叫妓女，叫待嫖者；活着不叫活着，叫待死者……厉先生真是极大地丰富和光大了汉语言词汇，也丰富和光大了经济学理论。在这样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能在一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已然不易，

博文思潮

天下思想